

走读泉州

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林 坚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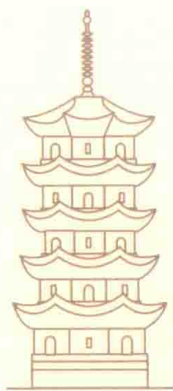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走读泉州

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林坚
•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读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 林坚主编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4

ISBN 978-7-5615-8775-1

I. ①走… II. ①林…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泉州—宋元时期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89628号

出版人 郑文礼

选题策划 宋文艳

责任编辑 冀 钦

装帧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机 0592-2181111 0592-21811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5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mm × 1 020 mm 1/16

印张 21

插页 1

字数 366千字

版次 202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2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走读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编委会

顾 问：刘群英 许维泽

主 任：刘宏伟

副主任：黄序和 沈耀钦 吴志雄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宏伟 阮安徽 李妍菲 吴志雄

沈耀钦 宋文艳 宋晓文 林 坚

林高仑 易景东 岳晋闽 郑文礼

黄序和 蔡国烟

主 编：林 坚

审 读：蔡国烟 宋晓文

我的家乡在泉州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有雄伟的开元寺东西塔
还有迷人的清源山老君像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的洛阳桥安平桥举世闻名
那里的刺桐港是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人与海相伴向海而生
北风下南洋南风就返航
到九日山祈风天后宫祈祷
再到南武当真武庙登高眺望
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有晋江磁灶和德化瓷窑
还有安溪青阳古老的铁矿场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有高高的六胜塔姑嫂塔
还有江口石湖如林的帆樯
泉州人与海相伴向海而生
冬季下南洋夏季就返航
到市舶司报关南外宗品茗
再到顺济桥德济门走走逛逛
那里是宋元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是泉州人扬帆远航的地方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有冠甲东南的泉州府文庙
还有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造像
我的家乡在泉州
在世界遗产边上
那里的伊斯兰圣墓草木葱茏
那里的清净寺历经千年沧桑
泉州人与海相伴向海而生
青壮下南洋叶落要归航
那里有我的摇篮血迹
还有满街香料和茉莉的芬芳
那里是无数人向往的光明之城
是故乡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第一篇 涨海声中万国商——刺桐古港	——01
回望历史：辉煌与沧桑	——03
闽海扬波：三湾十二港	——14
海上丝路：艰辛与荣耀	——32
第二篇 扁舟帆影天际归——商贸往来	——45
九日山祈风石刻	——47
市舶司遗址	——58
德济门遗址	——71
天后宫	——81
真武庙	——91
第三篇 泉南佛国几千界——民间信仰	——101
开元寺	——103
清净寺	——114
老君岩造像	——129
草庵摩尼佛造像	——142
伊斯兰教圣墓	——153

第四篇 宋家南外刺桐新——文化史迹	——165
泉州府文庙	——167
南外宗正司遗址	——179
第五篇 每岁瓷铁通四海——生产基地	——190
磁灶窑址	——192
德化窑址	——202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215
第六篇 飞梁遥跨海西东——交通网络	——226
洛阳桥	——228
安平桥	——239
顺济桥遗址	——250
江口码头	——264
石湖码头	——275
六胜塔	——285
万寿塔	——296
附录 邮说泉州“世遗”	——306
后记	——325

涨海声中万国商——刺桐古港

一部泉州古代史，就是一部泉州先民垦殖山林、扬帆海洋、拓展商贸的历史，一部刺桐城和刺桐港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皆知，从繁荣昌盛到衰落沉寂，从“闭关自守”到浴火重生的历史。

走进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宋代古船展览厅前悬挂的一幅大型国画——《涨海声中万国商》立即映入眼帘。画面上千帆云集，再现了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况：水深岸阔的港湾里，百船森列，千桅林立，装卸货的驳船在水上穿梭，码头上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到处是人头攒动，有的在扯帆摇橹，有的在扛箱扛包，有的在检点货物，有的在交易生意，各具姿态，栩栩如生，仿佛那喧闹的人声和涨潮的涛声，就要冲出画面向你袭来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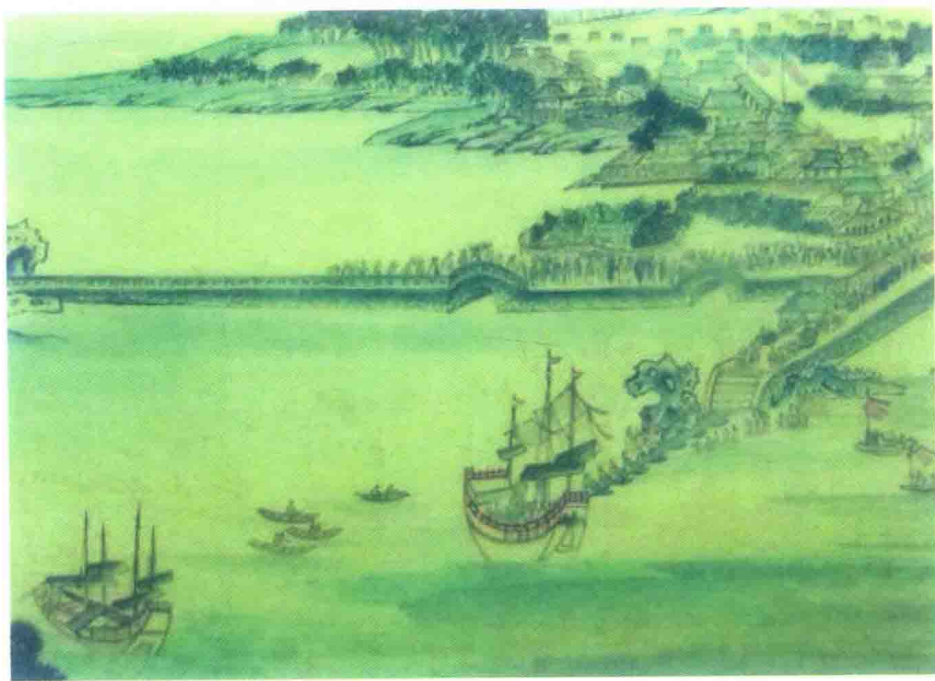


涨海声中万国商（国画）

这幅画作出自福建著名画家李硕卿之手，画名引用了宋代诗人李邴《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的诗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李邴原籍山东巨野，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资政殿学士，曾寓居泉州17年。诗人笔下的泉州，作为当时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商贾云集、帆樯如林，经济兴旺发达。然而，当诗人回望北方时，却发现故乡难回，只能独自在三洲路上踟蹰、慨叹。一喜一悲，既反映出刺桐港海内外商人来往不绝的喧闹，也映射出“苍官影里”诗人的落寞。

“涨海声中万国商”是宋元时期泉州商贸繁盛的真实写照，诗画相映生辉，浓缩的是一千年前刺桐港向海开拓、刺桐城开放包容的历史。



清乾隆《奉使琉球图卷》（局部）中的泉州港

回望历史：辉煌与沧桑

泉州，与海相伴，向海而生。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10至14世纪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刺桐港舶商云集，驰名世界，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回望这座曾经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领略她曾经的辉煌与沧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闽越族人就在泉州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渔猎活动，且“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汉人相继南下，闽中人口逐渐增加。东吴永安三年（260年），吴国在闽中设立建安郡，下辖九县，包括在闽南设立的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丰州。

此后，随着土地开发和人口增加，为了加强管理，西晋太康元年（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一个以福州为中心的晋安郡，下辖八县，包括由东安县改名的晋安县。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晋江流域开始进入较大规模的开发阶段，于是从晋安郡分出一个以闽南为中心的梁安郡（后改称南安郡），辖泉、漳、兴化等地，郡治仍设在南安丰州。丰州因此成为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时，流经丰州入海的晋江，“以晋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地处晋江入海口的梁安港遂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真谛）抵达晋安郡（治所在今福州），住佛力寺译经；陈天嘉二年（561年），拘那罗陀“泛小船，至梁安郡，更装大船，欲返西国”，因太守及信徒挽留，遂留住丰州延福寺翻译《金刚经》；陈天嘉三年（562年）九月，拘那罗陀乘信风欲还天竺，即从梁安港乘船，准备前往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不料因风信不顺，于年底飘回南海沿岸，后流居广州。这说明，梁安港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

朝，就是泉州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

隋唐五代时期，泉州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大批中原府兵、眷属入闽；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再次率领大批中原官兵、百姓入闽。这两次大规模移民不仅为当地增加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引进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从而加速了九龙江流域和晋江流域的开发。

唐开元六年（718年），泉州治所由南安丰州东移，并先后建设了衙城、子城（今泉州市区）。子城呈东西南北四方走向，有“东门行春、南门崇阳、西门肃清、北门泉山”，城外壕沟环绕，可通舟楫于城下，交通极为便利。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生产获得较大发展，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唐天宝年间（742—756年），诗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一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议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在诗人笔下，虽然依山傍海的泉州距离中原路途迢迢，但那里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商贸繁盛，南来北往的商人络绎不绝。诗人以此安慰赴泉州担任清源太守的好友，勉励他勇挑重任，为朝廷分忧，为百姓造福。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长达八年、席卷半壁江山的战火，不仅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中原移民大量南下；而且使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和阻塞，对外商贸交流急剧衰落。“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丝绸、瓷器等外销产品的主要途径。

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唐书称“黑衣大食”）取代倭马亚王朝（唐书称“白衣大食”），并迁都巴格达，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使丝绸之路西段由陆路转向海路，进一步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印度洋乃至东亚地区的商业交往，原先已经形成的东亚和印度洋两大航运贸易圈被更

紧密地串联了起来。

风云变幻的时局为泉州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泉州由此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海番舶接踵而来，岛夷斯杂”。朝廷对海外贸易也十分重视，要求地方官“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75）。

唐会昌年间（841—846年），诗人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中写道：“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描绘了泉州蕃商、使节频繁来往、对外贸易繁盛的状况。成书于唐会昌六年（846年）的《道里邦国志》，记载了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到泉州的情景，并将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唐天祐元年（904年），三佛齐国使蒲诃栗也在泉州登陆。朝廷为此设立录事参军，掌管蕃商、使节事务。

随着中外交流的密切，一些海外物种也被引进到闽南。如原产东南亚的刺桐（又称海桐），由海外传入泉州后，在城中大量栽植。晚唐诗人陈陶游历闽中时，盛赞泉州“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屏障满中都”。另一位晚唐诗人曹松则善意地提醒友人：“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

唐末五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潮、王审知治闽33年间，致力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促进海外交通，泉州因此受益匪浅。先后担任泉州刺史的王审邽、王延彬父子，勤勉为政，俭约爱民，使泉州经济很快得到恢复。王延彬治泉期间，实行宽商政策，大力发展商贸，“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因此海内外客商都乐意到泉州经商，地方当局也得以用海外贸易收入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泉州府志》称，王延彬在泉“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

此后，留从效、陈洪进先后治理泉州，同样大力发展经济，鼓励海外贸易，大大促进了泉州海外交通、商贸的发展。南唐时期，泉州升为清源

军，留从效出任清源军节度使。虽然他出身寒微，但素知民间疾苦，“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异时津梁有征，关市有税，屯田极租，盐榷擅利，苛虐之政，刻剥是务，公独一切蠲除”。他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多次“招徕海中蛮夷商”，鼓励泉州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

为了适应海外商贸、交通发展的需要，留从效在泉州设立榷利院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同时大举扩建泉州城。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他在唐代子城外扩建了罗城。城高1.8丈，城门从4个变成7个，包括东门仁凤、西门义成、南门镇南、北门朝天，以及东南通淮、西南通津和临漳，范围从3里扩大为20里，为唐代子城的近7倍。他积极倡导百姓种植刺桐以环绕、护卫城池。刺桐树高而叶繁，初夏开花，花色艳红，被称为“瑞桐”。后来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和贸易的兴盛，泉州便以“刺桐城”和“刺桐港”而闻名世界。

这一时期，泉州大规模围海造田或开垦梯田，兴修水利，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冶铁制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扩大海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泉州城南就围垦了大片海滩，规模最大的是陈埭。《泉州府志》记载：“陈埭，陈洪进所筑，其埭最大，合南浦诸水为陡门通归于大海，南洋田多仰焉。”

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以东南海港为依托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泉州生产的各种瓷器、铁器开始大量外销，“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由此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泉州已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正如历史学家庄为玑所说：“汉唐时期，中外通商依靠西部的‘丝绸之路’，唐天宝之乱以后，陆路不靖，才改为海路交通。当时，我国沿海出现了四大海港（交州、广州、泉州、扬州），泉州是四大海港之一。”

两宋时期，泉州海外交通更加发达，300年内泉州港实现了三次飞跃：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年，成为与广州并驾齐驱的中国两大海港；南宋末年，超过广州，成为国内最大的港口。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称帝，建立了大宋王朝。留从效适时进贡，称藩于宋。建隆三年（962年）留从效去世后，其部将陈洪进奉表于宋太祖，并向宋朝廷进贡了“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其中乳香和药就是泉州从海外输入的。宋太祖龙颜大悦，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宋军平定南唐后，陈洪进向宋太宗呈“献土表”，将所管辖的泉、漳两州共十四县“献于有司”，以表忠诚，先后被封为武宁军节度使、岐国公，位极人臣。

泉州也由此相对平静地由五代过渡到宋初，社会经济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自唐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泉州港，依然与海外各国保持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面对新王朝建立后出现的更广阔的国内市场，泉州港既可吸收大量转运而来的货物，也能提供更多的出口物产，为宋代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北宋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先后在广州（971年）、杭州（989年）、明州（999年）设置了市舶司，赋予专营海外贸易之权。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又诏书命广州转运使招徕番舶，发展海外贸易，一些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舶也伺机出入泉州。

宋神宗熙宁时期（1068—1077年），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开源节流，泉州的海外贸易亦被纳入改革之中。为制止非法贸易引起的税收流失，新政规定泉州商人出海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之后方可成行；回程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抽税），违规者严惩不贷。

这项新政给泉州海外贸易带来诸多不便。熙宁五年（1072年），福建地方官员即向朝廷提出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建议。宋神宗虽然对“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印象颇深，但因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牵涉面较广，主持新政的官员又有不同看法，于是只好暂时搁置下来。无奈之下，许多舶商便冒着被没收财产的危险，从泉州港直接出发。泉州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因此凋敝，反而逆势而上。只是风险集于海商一身，长此以往是难以为继的。

元丰年间（1078—1085年），再次担任泉州知州的陈侂向朝廷上奏：“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遵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

陈侂认为，泉州未设市舶司对海商十分不利。来往商舶皆须经广州，不仅多耗时日，使许多商人因错过季风而耽误行程；而且从广州至泉州的航线多沙洲地带，航行较为不便，常有海舶搁浅；这样对朝廷收入也会有很大影响，因此请求朝廷在泉州置司，仍未获准。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推行“元祐更化”，熙宁时期的贸易新政被重新审视。元祐元年（1086年），户部尚书李常奏请朝廷在泉州、密州置市舶司获得批准。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设立昭示泉州海外贸易进入了官方管理时代，泉州商人与海外番商均可在泉州名正言顺地经营贸易，大大提高了商贸效率，对泉州海外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到北宋中后期，泉州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个“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忙港口。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迁。泉州市舶司虽屡经罢、设，但鉴于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因此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泉州市舶司的独立建制恢复后便稳定了下来。

南宋立国江南，因此更加倚重海外贸易。宋高宗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为了吸引海外舶商，朝廷在泉州设置“来远驿”，专门接待外国的使节和商旅，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高宗还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对“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而对促进海外贸易有积极贡献的外商和华商则授予官职，尽力为外商活动提供各种便利。

一时大量番商云集泉州，世家豪族多在城南营造府第，构筑园林，南城不断被拓地增筑。泉州由此形成顶、中、下三个十字街，城中六条主要街道与各个城门连接，东到洛阳、西到丰州、南到江滨、北到册山岭，东南可通东海。

泉州港由此迎来历史上的繁华时代，形成众多不同方向的海外航线：一是由泉州港北上经明州至高丽、日本航线；二是泉州至东南亚航线；三是泉州至南亚和西亚航线。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泉州港

从海外诸邦进口泉州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泉州出口至诸番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铁器等手工业制品，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这是当年泉州港商贸繁华的真实写照。

商业的繁荣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南宋绍兴末期，广州、泉州